

中国古代文学巨匠

Zhong Guo Gu Dai Wen Xue Ju Jiang

徐潜 主编 张克 崔博华 副主编

绚丽辉煌的文学

Xuan Li Hui Huang De Wen Xue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 巨匠



徐潜／主编

张克 崔博华／副主编

臧笑飞 佟雪／编 著



吉林出版集团—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巨匠 / 徐潜主编.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472-1520-3

I. ①中… II. ①徐… III. ①作家—生平事迹—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IV. ①K825.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3611 号

书 名 中国古代文学巨匠

主 编 徐 潜

副 主 编 张 克 崔博华

责任编辑 崔博华

装帧设计 DAS 工作室

出版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三河市同力印刷装订厂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2-1520-3

定 价 26.00 元

序 言

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文化的繁荣,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对既有文化传统的继承和普及。该书就是基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普及而策划的。我们想通过这套图书把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展示出来,让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能够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我们今天振兴民族文化,创新当代文明树立自信心和责任感。

其实,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一样,都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综合体”,是一种长期积淀的文明结晶。就像手心和手背一样,我们今天想要的和不想要的都交融在一起。我们想通过这套书,把那些文化中的闪光点凸现出来,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价值的营养。做好对传统文化的扬弃是每一个发展中的民族首先要正视的一个课题,我们希望这套文库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在这套以知识点为话题的图书中,我们力争做到图文并茂,介绍全面,语言通俗,雅俗共赏。让它可读、可赏、可藏、可赠。吉林文史出版社做书的准则是“使人崇高,使人聪明”,这也是我们做这套书所遵循的。做得不足之处,也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4年2月

目 录



一、名士风流——竹林七贤	/ 1
二、诗中圣哲——杜甫	/ 31
三、文坛全才——苏轼	/ 70
四、铁马秋风——陆游	/ 109
五、红楼绝唱——曹雪芹	/ 149

名士风流——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指魏晋时期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位名士，他们常在竹林中聚会，因此得了这个雅号。在混乱黑暗的时代，竹林七贤把老庄哲学的无为、尚真与返归自然的精神发展到了极致，形成了一种自由解放的新气象和不伪饰、不矫情、顺其自然的新的道德风尚。东晋之后，竹林七贤的影响逐渐传播开来。随着时光的推移，他们已成为魏晋时期文人精神理想的一种象征。

一、竹林七贤与竹林玄学

竹林七贤是指魏晋时期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位名士。他们常在河内郡山阳县（今河南修武附近）的竹林中聚会，因此得了这么个雅号。东晋之后，竹林七贤的影响逐渐传播开来，随着时光的推移，他们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更是魏晋时期文人精神理想的一种象征。

汉朝末年，天下大乱，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经过二十余年的征战，逐步统一了中国北方地区，为曹魏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同年十月，东汉献帝无可奈何地以所谓“禅让”形式交出了皇位，曹操的儿子曹丕代汉称帝，建立魏朝。然而，还不足半个世纪，尚未饱尝皇权之乐趣的曹氏家族便不得不面临一场被司马氏家族取代的悲剧。

司马氏是汉末河内望族，这个家族的几个成员，特别是司马懿，曾经在抗击东吴、蜀汉的战役中表现突出，为曹魏政权的稳固和发展立下赫赫战功，受到曹魏统治者的重用。公元226年，曹丕病逝，临终前他将自己的儿子魏明帝曹叡托给司马懿和曹魏宗室的大将军曹真等人辅佐。公元239年，曹叡去世，年仅8岁的曹芳继任，改元“正始”。由司马懿和曹真的儿子大将军曹爽共同辅佐。随着他们威望的日增，他们的欲望和野心也日益膨胀，为谋求更高的权位，司马懿和曹爽展开了政治上的较量。年轻的曹爽先下一城，奏请当时的皇帝曹芳降旨，封了司马懿一个有名无实的太傅，架空了他的权力。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则将计就计用在家装病的方法来麻痹对方，暗中等时机，准备发动致命一击。公元243年，大将军曹爽随皇帝曹芳外出扫墓，托病在家的司马懿抓住了

时机，迅速组织力量屯兵司马门，控制了京都，史称“高平陵之变”。在这场政变中，司马懿将曹爽兄弟及其僚属尽数杀戮，夷灭三族，从此控制了曹魏政权。

司马懿死后，继承他事业的长子司马师更是把朝廷变成司马氏一家的天下，不仅安插大



量亲信在重要位置任职，逐渐铲除尚在内朝的曹氏残余势力，而且还废黜了不太听话的魏帝曹芳，另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

不久，司马师病死在许昌。他的弟弟司马昭继之执掌朝政，被封为晋公。此时，司马氏集团的险恶用心已昭然若揭。公元260年，威权日去又不胜其辱的曹髦，竟以皇帝之尊，亲执刀剑，率领近侍和僮仆数百人，鼓噪出宫，讨伐司马昭，结果被司马昭的死党贾充、成济等人刺杀于南阙之下。



公元262年灭蜀之后，司马昭的功勋达到极点，被封为晋王，出入戴皇帝旒冕，使用皇帝仪仗，在封国内自行设置官员，实际上已成了不登皇位的皇帝。

司马昭去世后，其长子司马炎承袭其位。他不像祖父辈那样躲躲闪闪，在元帝曹奂咸熙二年便指使王沈、贾充、何曾等人，用当年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的方式，把曹奂赶出皇宫，急不可耐地登上皇位，建立了晋朝，史称西晋。

司马氏集团在利用手中强大的军事力量夺取政权的同时，并没有忘记给自己戴上遵守儒家伦理规范的假面具。他们捡起被人们遗弃的纲常名教，遮掩其篡位的阴谋，拉拢约束自己的党徒，诛除异己。一时间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于是，远离政治斗争的核心，避免对政治问题的争论，遁形于山林，明哲保身，便成了当时士人的选择。“竹林七贤”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士人团体。他们常常在竹林中聚会，纵酒行乐，谈玄论道，过着潇洒倜傥的生活。

众所周知，玄学的理论基石经历了从“贵无”到“崇有”，再到“虚无”的否定之否定这一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玄学家从政治改革寻找出路，转向为士族文人自身寻找人生精神归宿的转变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玄学“有无”之说的探索演变过程，正是士人对于“名教”和“自然”两种人生态度进行比较遴选的过程。从根本上说，士族文人关于“名教”和“自然”的选择，正是玄学关于“有”和“无”的政治哲学在士人政治生活选择中的投影。正始十年（公元249年）高平陵事变之后，司马氏统治权威的确立形成，随着何晏、王弼、夏侯玄等第一代玄学元老的前后离世，玄学的政治主题也基本宣告结束。这个事实告诉人们，无论统治者按玄学家所设计的那样，以“平淡无味”的“中庸之德”来进行统治，还是玄学家自己以“平淡无味”的态度面对社会政治

问题，都是行不通的。

对于嵇康、阮籍等竹林文人来说，讨论政治问题不但危险，而且有些奢侈。因为这时最重要的问题，已经不是宇宙的本原和理想人格的问题，而是在改朝换代的复杂时期，士族文人的生存问题和他们的精神寄托问题。他们拿起了王弼哲学中的“崇本息末”的理论武器，用来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他们认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本”即是士族文人自身的精神支柱，一个只能存在于纯粹意识世界中的自我；而此时的“末”则包括所有那些现实世界的利益和枷锁，即所谓“名”。于是，王弼“崇本息末”的理论就被嵇康、阮籍等人明确而正式地改造和理解成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玄学的政治主题也就自觉地演化为人生主题了。

标志这一玄学人生主题确立的，是文人个体精神寄托的无限自由和自我的精神人格，这种人格就是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着力描绘的大人先生形象。大人先生有着独特的时空尺度，“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这里的“大道”表层意义为大路，实则指自然之大道，本体之大道。这种“道”已泯灭了时空的界限，“无先无后，莫究其极”“乃与造化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大人先生的人格力量涵盖了整个宇宙、历史和人类，向着永恒无限性展开。大人先生式的人格和理想，是阮籍的追求。这种追求途径以纯粹自然的本真方式加入到宇宙大化之中去彻悟宇宙生命的伟大，提升人的境界，最终以诗化的形式来实现对死亡和痛苦的消解与超越。这种理想的人格精神境界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在《清思赋》中，阮籍将自己的理想境界虚拟为一位美妙无比的“河女”（织女）。“河女”如初升之云霞，“采色杂而成文兮，忽离散而不留”“若将言之未发兮，又气变而漂浮”“自流眄而自别兮，心欲来而貌辽”，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超人形象。这就是世间凡人对这种超凡人格境界的仰视角度。



据说阮籍这一思想的形成，受到了当时著名隐士苏门山人孙登的启示。据史书记载：阮籍“嗜酒能啸”。魏晋名士经常优游于山林，尽情享受现实生活中无法享受的欢愉，他们用啸声表达自己的感受。因此那时啸风盛行，啸也是名士的一种风



度。阮籍在当时是最善啸的名士之一，据说他的啸声能传出几百步远。

阮籍听砍柴伐木的人说，苏门山中居住着一位得道的真人——孙登。夏天他穿着草编的衣服防暑，冬天他用长长的头发盖住自己保暖。平时常弹奏只有一根弦的琴自娱自乐。几经寻访，阮籍终于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孙登。见面后，两人伸开双腿在岩石上相对而坐。阮籍便滔滔不绝地谈起古来圣贤的丰功伟绩和醇厚美德，然而孙登就像是没听见一样，理都不理；阮籍以为他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又和他说起自己对儒道两家的学说见解。孙登还是不置可否；阮籍无奈，长啸一声。孙登这才开口说道：“不妨再啸一声。”阮籍又啸了一声，直到兴致尽了，才退下山来。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山上忽然发出巨响，像几支乐队在演奏，满山满谷都充斥着回响。仔细一听才知道，是苏门山人孙登从丹田之中发出的啸声，那纯净的啸声令阮籍不自觉地停下脚步，侧耳倾听。从孙登响彻山谷的啸声中，阮籍领悟到了人生自由境界的所在。也意识到，与孙登相比自己并没有真正脱俗，于是回到家中便挥笔写下了《大人先生传》。他笔下大人先生的超脱之姿和自由之境，正是受苏门山人的啸声而激发的人生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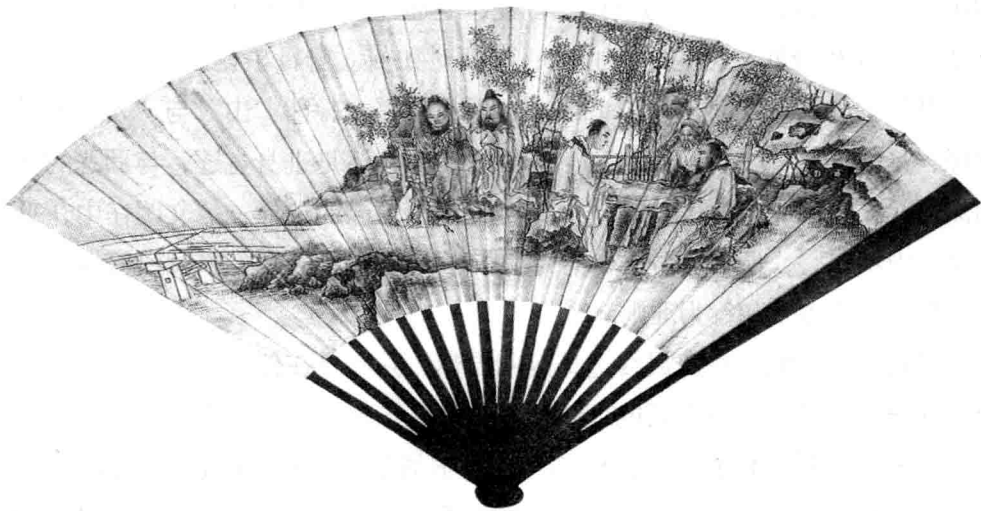
嵇康以自然超脱为生命之本，以名教入世为生命之末的思想与阮籍是一致的。在《卜疑集》中，嵇康模仿屈原《卜居》，在自问自答中，对自己的人生旨趣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反思与抉择。首先，他通过虚构的宏达先生，表明了自己高洁的心性和身处浊世的彷徨心绪；继而对如何立身行事提出了一系列疑问，若将其所提的数十个疑问予以归纳，主题只有一个，即“出”与“入”的矛盾抉择，是继续坚守节操，维护人格的独立自由；还是进身竞逐，与邪恶的社会同流合污。最后，通过太史贞父之口，说出了自己的选择：“文明在中，见素表璞；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鉴乎古今，涤情荡欲。”明确了人生追求和行为准则。

所有这些表明，嵇康最终选择返归自然，并不是在任情纵欲的时代思潮中随波逐流，而是认真思考后的理性抉择。什么是自然？为什么返归自然？返归自然后要过一种怎样的生活？他都已想得很清楚了。嵇康的自然，源于庄子，而有所超越。在《释私论》中，他这样解释自然的人生理想：“夫称君子者，

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远乎道者也……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以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这里作为理想人格的“君子”需具备两个要素，一是无措，即不刻意地计较是非得失，不受世俗的纷扰。二是通物，即顺通事物本来的态势。这样的解释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据此可以作多种延伸。嵇康从“通物情”把自然引向了自我。从上下文的对应关系来看，上言“越名教而任自然”，不是听任原始野性的泛滥，而是以真统率，以不害众为原则，返回自然的本性，接受自然的法则，在触景而动、任心而行中体现善的准则。“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本质是摒弃言行当中那些虚伪的表现，返回到自然纯净的心灵。下言“越名任心”“越名教”，就是超越名教背后一切虚伪的言行。“任自然”即“任心”，自然即心，即我心之自然。

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文人不仅以其理论文字，更重要的是以其人生实践着宣传玄学的理论根基“无”这一概念，并将其从政治人格建构变为人生态度，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而这种人生态度的外化表现就是他们从对名教的依恋，终于转变为彻底地放弃名教，代之以自然的人生选择。

正始名士的玄学思想和人生态度的转变，其核心在于以超然的人生态度取代热衷政治的强烈欲望，其外在表现形式则是以放诞不羁的行为作风取代蝇营狗苟的政治角逐。简言之，就是崇尚自然取代了追逐名教。



二、刚肠嫉恶的嵇康

嵇康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嵇康（223—262年），字叔夜。本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其先人因躲避仇家，迁至谯国铚县（今安徽淮北临涣镇），改姓嵇。关于为什么改姓嵇，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取其祖籍所在地会稽的“稽”字上半部分，加在“山”字之上，以此为姓，用以纪念祖籍之地，表示永不忘本的意思；另外一种说法说铚县有一座山，名叫嵇山，因为奚家迁移至此，安家在山旁边，取山名作为自己的姓氏，所以姓嵇。



嵇康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由母亲和兄长把他抚养长大。他励志勤学、广有才名，在哲学、文学、书画、音律方面很有造诣。史书记载，成年后的嵇康高大魁梧、仪表堂堂，虽然不刻意装扮自己，却能通过超脱的气度流露出自然的美感。在魏晋那样一个注重外貌风度的时代，这样一位玉树临风、气度非凡的名士，自然备受推崇，声名远播。

嵇康 20 多岁的时候，娶了曹魏宗室的长乐亭公主（一说为曹操孙女，曹林之女；一说为曹操曾孙女，曹林的孙女）为妻。婚后的嵇康被朝廷封为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据记载，中散大夫只是个俸禄六百石、掌管议论的闲职。但嵇康是一个崇尚自由、不受束缚的人，他不愿与政治有过多的瓜葛，即使是个挂名的闲职，对他来说仍然是一种羁绊。同时，嵇康也十分清楚，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自己作为曹魏宗室的姻亲，即便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也还是很容易受到司马氏的猜忌。与其诚惶诚恐地在朝中做官，不如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居住下来，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于是他离开了朝廷，来到河内山阳，在这里一住就是二十年。

据考证，山阳就在今天河南省修武县百家岩附近，百家岩是天门山南坡下一个约高 170 米、宽 500 米的巨大峭壁，峭壁下一低矮的小山便是嵇山。峭壁与嵇山之间有一片约宽 30 米、长 100 米的平缓地，可供百家人居住，故名百家岩。竹林之游的古迹，也集中在这一带，如刘伶醒酒台、孙登长啸台、阮氏竹

林、嵇康淬剑池等。对此处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明统一志》《河南通志》《大清一统志》《道光修武县志》等，均作了详细记载。

另外，修武县考古部门近几年在百家岩发现了嵇康锻铁的遗址和竹林七贤饮酒用过的酒坛。专家们在百家岩发现了暴露于地表的红烧土约五平方米，红烧土的四周有许多汉代瓦当、红陶菱形纹饰缸沿和陶片，并出土酒坛三个。根据该酒坛的质地、彩绘、纹饰、造型判断，该酒坛完全符合魏晋时期的制陶风格，由此确定为嵇康锻铁遗址和竹林七贤酒坛。

那么，嵇康为什么会选择在百家岩隐居呢？百家岩所在的云台山风景秀美，潺潺的山泉掩映于茂林修竹之间，而且云台山距都城洛阳仅有二百多里，毗邻贯通全国的古驿道，交通便利，信息畅通。为名士的游乐和学术交流提供了条件。这里既无物质之匮乏，又无文化之寂寞，也就成了嵇康隐居的首选之地，也是他暂时获得精神超越的理想乐土。

嵇康虽然隐居在云台山的百家岩，但还是声名远播。他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博古通今、长于清谈、琴艺超群，生性好酒，不拘礼法，倾慕神仙，注重养生。他把士人心目中“高士”的优点和行迹集于一身，以崇高的人格之美感召着身边的人。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等人都先后来到这里与他结交，他们在竹林中纵酒长啸、畅谈玄理。以狂傲放荡的叛逆姿态，蔑视一切外在的律令成规和礼法时俗，超越一切虚伪的道德纲常，让生命回归自然，让精神享受自由，实现着庄子所阐述的“逍遥游”理想。

隐居在百家岩的嵇康除了和朋友们一起饮酒、谈玄，还常以打铁为乐。红红的火苗，乒乓的响声，使他感受到生活的充实和丰厚。周围的乡亲看他的手艺不错，常常请他帮忙打些镰刀、锄头一类的农具，对于人家送来的报酬，嵇





康从来都推辞不受。时间长了，大家觉得过意不去，便不时地送些酒肉到他家里，以示感谢。每到这时，嵇康总是显得特别高兴，他把酒肉摆好，留下来人和他一起享用。席间说说笑笑，好不热闹。然而，对待那些不速之客，嵇康就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了。



贵公子钟会是司马昭的宠臣，有才善辩，他久慕嵇康大名，想要拜会他。一日，嵇康正在向秀的辅助下打铁，钟会带着大批的官员随从，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地来到嵇康家拜访。嵇康本就不喜欢钟会这种趋炎附势的虚伪之人，见钟会大摇大摆地招摇过世，心中更是多了几分厌恶。他自顾自地抡起沉重的铁锤，吩咐向秀把风箱拉得呼呼作响。二人旁若无人地打起铁来。钟会在院子里站了许久，也没人招呼他，只好快快地打算离开。这时嵇康才爱理不理地对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受了冷遇，又在众人面前失了面子。气呼呼地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一甩袖子带着人走了。有了这一次的教训，钟会也明白，对于他这样的人，嵇康在骨子里是瞧不起的。他写完《四本论》，很想让嵇康看一看，于是把书揣在怀里，来到嵇康家门前。他在门外徘徊了很久，始终没有勇气进去，只得把书从墙外扔进了院子。钟会后来在司马昭面前污蔑嵇康的言行，恐怕在此时就埋下了祸心，同时更是源于他心里那种无时不在的压迫感和恐惧感。有嵇康这颗星光耀于世间，他就永远抬不起头来。

如果说打铁让嵇康体会到生活的平实之美，那么弹琴便让他感受到艺术的高雅之韵。嵇康“琴艺超伦”，在当时负有盛名，他最喜欢弹的曲子便是《广陵散》。《广陵散》是一首古琴曲，嵇康得到这首曲子的过程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传说，有一次，嵇康到洛水之西游玩，住在华阳亭。当晚，皓月当空，四周十分幽静。他焚香祝祷毕，便取出随身带着的古琴弹奏起来。这时，一位穿戴古香古色的客人走到他身旁，嵇康请客人落了座，两人便谈论起音律来。见客人谈吐不凡，特别是对古琴的弹奏和琴曲的创作见解十分精辟，嵇康非常佩服。聊了一会儿，客人便弹奏了一曲。这是一首嵇康从未听到过的新曲。开始时，轻弹慢拨，弦音幽静，逐渐转为沉郁、悲愤；后来弹奏加快，力度渐强。随着手指在弦上的飞舞，琴声陡然激越雄壮，犹如勇士横戈跃马，又似豪侠挥

矛击剑，真是妙极了。嵇康对客人高超的琴艺佩服得五体投地，客人便对嵇康讲起了这首琴曲的故事，他说：“战国时期，韩国有个叫聂政的人，他的父亲因为没有按期为韩王铸造宝剑，被韩王杀害了。聂政发誓要为父亲报仇。他离开韩国到泰山刻苦学琴，十年后，终于成为一个高明的琴师。聂政回到韩国，在离王宫不远的地方弹琴，美妙的琴声使走路的人停下脚步。聂政高超的琴艺传到韩王耳朵里，韩王马上召他进宫演奏。进宫之前，聂政在琴箱里藏了一把匕首。韩王听着聂政的演奏，完全被那不同凡响的音乐迷住了。就在这时，聂政从琴内抽出匕首，猛扑上去，一刀刺进了韩王的胸膛。接着，他又用匕首将自己的面容毁坏，免得让人认出他的样貌，连累家人。最后，聂政自刎而死。”

客人告诉嵇康，刚才他弹的曲子，名叫《广陵散》，表现的就是聂政刺韩王的故事。嵇康听了，恳切地请求客人教他。客人一段一段耐心地教给了嵇康，并再三叮嘱他千万不要再把《广陵散》传给其他人。说完，客人便飘然而去了。

嵇康得此爱曲，勤奋练习，把《广陵散》演绎得愈发尽善尽美。于是，听他弹奏《广陵散》，也就成为朋友们竹林聚会时难得的享受。

嵇康不但琴艺精湛，而且对音律也有很深的造诣，他是当时杰出的音乐理论家。他撰写的《琴赋》主要表现了他对琴和音乐的理解，同时也反映了嵇康与儒家传统思想相左的看法。他还撰写了《声无哀乐论》，着重探讨了音乐的本质、音乐与情感的关系、音乐与教化的关系三个方面的问题，也就是音乐自身的规定性问题。他提出，声音源于自然，不会因为人们的喜怒哀乐而有所变化，声音本身是不具备情感的，更没有悲喜之分。声音的感情色彩是人赋予的，只有把声音和人的主观情感体验结合在一起，才有了哀乐。

嵇康还善于写诗，特别是四言诗，现存的诗歌有六十多首，四言诗占了一半以上。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嵇康不仅是诗人，还是著名的玄学家、文学家。流传下来的散文有十五篇。文章中展示了他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思考。



公元 255 年，司马昭想把大名鼎鼎的嵇康征召到朝廷为其效命。嵇康不愿意，只好离开了竹林，躲到了河东。一走就是三年。在大山里，嵇康遇到了大隐士苏门山人孙登。他与孙登相处了三年，每次向他请教问题时，孙登都是避而不答。



嵇康常常因此而惋惜。直到临别时，嵇康遗憾地对孙登说：“我要走了，您真的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了吗？”这时，孙登才慢悠悠地说：“你不了解火吗？火生来就有光，可是它也要靠干柴来保持它的光焰。人生而有才，但也要识时务。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孙登又告诫嵇康：“你很有才能，但缺少远见。当今之世，想要免除灾难、保全自身是很难的。今后你要谨慎做人，少发表议论。”事情证明，孙登这种说法是很有预见的。



公元261年，山涛由吏部选曹郎调任大将军从事中郎，他向司马昭推荐好友嵇康接替他的位置。为了表明自己绝不出仕的态度和立场，嵇康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在信中，他陈述了自己不能从命的原因。有所谓的“必不堪者七”和“甚不可者二”。

“必不堪者七”也就是七个绝对不能忍受的事：做官不能睡懒觉，为一不堪；喜欢弹琴唱歌、打猎钓鱼，而做了官后，身边有吏卒守候，无法随意行动，为二不堪；身上长虱子，咬得难受，要不停地搔痒。可做官要头戴官帽、身穿官服，拜见上司，需长时间正襟危坐，腿脚发麻，也不得动弹，为三不堪；一直不善于写信，也不喜欢写信。做官后人事关系复杂了，往往书信堆满几案，你不及时处理吧，别人会说你玩忽职守。要勉强去做，又是本性难以为之的，为四不堪；平生最讨厌吊丧，世人则看得很重，做了官要违心顺俗地去做这些事，为五不堪；不喜欢俗气的人，做了官要与他们周旋，每天耳朵里装的都是闲言碎语，面对的是千奇百怪的面孔和伎俩，为六不堪；性情急躁怕麻烦，做官劳神费心的事太多，为七不堪。

“甚不可者二”就是两个绝对不可以忍受的：一是平时喜欢“非汤武而薄周孔”，做官后也不会改变这个观点，这无法被当局所容忍；二是性格刚烈，嫉恶如仇，直率易怒，这种性格是做不好官的。据嵇康自述，他的这些古怪脾气自小养成。他幼时丧父，由母亲、长兄抚养成人。母兄溺爱，不加呵责，也不逼他读儒学经书，使他从未领教过外界的压力和约束，所以他只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不会迁就于任何人和事，包括自己的生理要求——他小便急了，从不马上去厕所，总是憋着，实在憋不住了才肯起身。一月半月不洗头脸，蓬

头垢面也是常事。身上长满虱子，不到痒得受不了的程度绝不去洗澡。如果说这些古怪的习惯是小时无意养成的话，那么长大以后，饱读诗书的嵇康更是有意放浪形骸，对自己不加约束。

嵇康在信中责怪山涛不了解朋友的个性，强人所难。嵇康在信里说的都是真心话。他确实是遇事便直言尽情，不知忌讳，这也是性格使然。“不堪者七”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只是嵇康不为官的一些借口。为官必然要多些繁文缛节，少了自由时间，这都是些小问题，不是要害问题。但那“甚不可者二”就不能等闲视之了。“一不可”：“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嵇康的性格就是如此，极端厌恶世间所谓“君子”的一切。他视学堂为太平间，视诵读为鬼话，视六经为垃圾，视仁义为腐臭。看一眼经书眼睛就会害病，学一下礼仪就会驼背，穿上礼服就会筋骨扭转，谈起礼典就会牙齿烂掉。这已经很大逆不道了。再加上“二不可”：“非汤武而薄周孔”，这个就更严重了。汤武是以武力平定天下的，周公是辅佐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的，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司马氏一直在觊觎曹魏天下，打的就是迫使曹魏天子将政权禅让给自己的主意。嵇康狠狠地戳到了司马氏的痛处，司马昭是绝不会放过他的。

嵇康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他把绝交信写那么长，就是他对山涛的坦诚倾诉。嵇康这样泾渭分明地和山涛划清界限，其真正目的并不是要从此切断他们的友谊，而是向司马氏表明自己不愿为官的立场。如果只是友情覆水难收，完全可以冷冰冰地三言两语应付了事，甚至不置一词。

嵇康之后还写过另外一封绝交书，绝交对象是吕巽，即吕安的哥哥。吕巽、吕安两兄弟原本都是嵇康的朋友，但这两兄弟突然闹了一场矛盾。原来吕巽看上了弟弟吕安的妻子，偷偷地把她灌醉并占有了她。吕安本打算将哥哥告上朝廷，但嵇康劝阻他家丑不可外扬，让他先忍下来。谁知，吕巽为了掩饰自己的



罪行，居然恶人先告状，给弟弟安了一个“不孝”的罪名，还上诉到了朝廷。嵇康当即拍案而起为吕安辩解。但在吕巽的蛊惑下，吕安已因“不孝”而获罪，嵇康唯一能做的就是痛骂吕巽一顿，并宣布与之绝交。这次的绝交信写得很短，也极其悲愤。在心中，嵇康怒斥吕巽诬陷无辜、包藏祸心，后悔自己以前无原则地劝吕安忍让，自愧对不起吕安。